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t Mid-to-High Speed:
Path and Policy

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 路径与政策

张长春

郑征

等
著



社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
路径与政策

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 路径与政策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t Mid-to-High Speed:
Path and Policy

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 路径与政策

张长春 郑征 等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路径与政策 / 张长春等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201-2069-2

I. ①促… II. ①张…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增长-
研究 IV. ①F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7942 号

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路径与政策

著 者 / 张长春 郑 征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刘宇轩

责任编辑 / 王婧怡 刘宇轩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经济与管理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49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069-2

定 价 / 7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本书主要从增长要素特别是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上，探讨如何实现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问题。为了保持研究的相对完整性，我们还对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高质量的中高速进行了解释，并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能情景进行了预测。

关于研究视角。本书从经济长期增长的国别比较分析中，探讨我国特定历史阶段增长要素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历史时空中去观察我国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有助于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我国各阶段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变化特征和经济增长的规律性。

关于总论框架。首先，将体制转轨带来的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放到经济增长的历史时空中去观察，发现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实质上是特殊转轨背景下的阶段性经济追赶现象。从国际经验看，阶段性高速增长后，增长要素的变化必然带来经济增速的明显回落，回落幅度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幅度。其次，从增长规律、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考察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的增长潜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关键领域的改革，改革进程和改革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资本形成增速向下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由此推断“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将呈现一个幅度较大的区间。再次，针对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通过改革创新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使经济增长趋近区间上限，防止危机导致增长中断，避免快速增长末期因基础能力不足陷入增长停滞。最后，对影响增长质量的若干重大关系进行简要分析。

简言之，解释过去的高速增长，判断“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经济增速会回落到一个幅度较大的区间，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趋近区间上限、防止短期中断、避免长期停滞，提高增长质量等内容，构成本书总论的总体框架。

关于落实新发展理念。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两个根本动力。平衡协调的结构效益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研究表明，环境规制短期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抑制作用，但长期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经济增速预测中我们对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中性处理。考虑到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战略，我们在定量预测中假定净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零。研究还表明，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正向激励作用，而当经济发展水平到达某一临界点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阻碍经济增长，结合社会发展水平，我们在定量预测中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中性处理。

关于短期需求管理。长期增长包含了总需求高于或低于总供给的周期性波动。但严重的内外部冲击导致的总需求长期大幅下降可能损害增长潜力，在总论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对审慎适度的需求管理进行了简要分析。

本书的两点新意。第一，“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一个幅度较大的区间，趋近区间上限需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为“十三五”前两年经济增长遇到的困难提供了部分解释，也表明“十三五”时期个别年份实现预期增长目标可能会遇到较大困难。这一结论的主要理由是，推进改革的进程和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上的实际效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如果改革进展和改革实效达至预期，全要素生产率就能够实现较快增长，储蓄率下调但幅度不会太大，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形成将推动经济增长趋近潜在增长率区间的上限；如果因改革方案设计不周、执行出现偏差、落实不到位、关联改革不配套等原因，使改革红利显现时点、实际效果低于甚至远低于预期，经济增长可能会趋近区间下限。

第二，快速增长末期落入增长陷阱的根本原因，是包括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国家治理在内的基础能力的严重不足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急速大幅下降。积累基础能力的初始成本很高、时间很长、互补性很强，长期的努力和投入才会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体现出来。有必要持续推进改革创新，增强基础能力，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结构转型推动，逐渐转向主要由基础能力推动，避免在快速增长末期陷入增长停滞。

由课题研究成果形成的本书其各章执笔人分别是：第一章张长春，第二章郑征，第三章岳国强、祁玉清、朱海宇，第四章应晓妮，第五章杨艳芳，第六章林勇明，文献综述岳国强、朱海宇，调查报告一应晓妮，调查报告二李泽正，调查报告三杜月，调查报告四郑征。全书由张长春统稿。

本课题研究先后得到了多位专家的悉心指导，专家们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给课题组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此，课题组对专家们的帮助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限于研究水平，本报告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请指正。

课题组

2017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路径与措施	001
一 追赶型高速增长后必然出现经济增速的明显回落	002
二 “十三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为一个幅度较大的区间	006
三 通过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趋近经济潜在增长率上限	024
四 通过审慎开放金融市场防止经济增长短期中断	034
五 通过持续增强基础能力避免陷入增长停滞	037
六 平衡协调好影响中长期增长的若干重大关系	041
第二章 五年规划实施中的政策适应性分析	049
一 本章拟探讨的问题和方法	049
二 五年规划政策实施历史进程	052
三 历次五年规划政策适应性评价	063
四 “十三五”规划政策实施适应性评价	070
五 提高“十三五”规划政策实施适应性的建议	075
第三章 2017~2050年经济增长趋势分析	080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	080
二 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	081
三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	084
四 2017~2050年我国经济增长趋势判断	086
五 人口红利及库兹涅茨效应等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094
附录1 不同研究对中国资本存量测算的比较	096

附录 2 不同国家 TFP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	097
附录 3 中国历年 GDP、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估算值	099
附录 4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测算	101
附录 5 2016~2050 年人口及年龄结构估计	121
第四章 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31
一 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结构的特点	131
二 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136
三 计量分析	143
四 国际比较	146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151
第五章 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156
一 引言	156
二 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关理论	157
三 环境规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	160
四 主要结论	166
五 政策建议	168
第六章 “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国际经验与启示	175
一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及主要特征	175
二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179
三 两类国家对比：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及相关影响变量的分析	180
四 对我国现阶段的启示	184
附录 文献综述：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研究文献综述	188

调研报告一 重视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支撑

- 对深圳市的调研 210

调研报告二 持续中高速增长取决于改革创新

- 海南省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调研报告 216

调研报告三 西部地区如何促进中高速增长

- 对张掖、赤峰、呼伦贝尔市的调研 230

调研报告四 市场化是东北地区中高速增长的关键

- 对大庆市的调研 238

第一章 总论：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路径与措施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增长潜力被压缩到一个独特的制度转轨进程中的集中释放。长期高速增长后增长要素的变化必然带来潜在增长率的明显回落，回落幅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密切相关，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或高质量中高速增长。“十三五”时期，释放中西部人口库兹涅茨效应仍有一定潜力，储蓄率的下调幅度取决于体制结构性因素的变化，推进改革的进程和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上的实际效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2016~2020 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在 5.5%~7.2%。按照保守的增长情景估算，到 2024 年我国人均收入将达 1.3 万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业；到 2050 年将达 4 万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业。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路径是通过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促进提高劳动参与率、释放人口库兹涅茨效应、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改善投资效益、推动科技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趋近潜在增长率上限。要审慎把握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次序和节奏，防止内部失衡与外部冲击叠加共振引发危机。要适应追赶型增长后期结构转型动力趋弱形势，需要更多依靠基础能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化特征，持续增强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等基础能力，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更多地依靠结构转型转向更多地依靠基础能力的提升创造条件，避免落入增长陷阱。还要平衡协调好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若干重大关系，实现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

一 追赶型高速增长后必然出现经济增速的明显回落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我国经济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被冠以增长奇迹。但如果将近 40 年的经济增长表现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中去观察并进行国际比较，看似令人称奇的经济增长实则是增长潜力被压缩到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集中释放。将特定阶段的经济增长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期和全球视野中去审视，有助于更冷静、更清醒地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特殊的制度转轨与不特殊的经济增长

1. 独特的渐进性转轨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制度条件

改革开放后，我们没有采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激进型转轨模式，也未转向多数欧洲国家奉行的“莱茵模式”和美国遵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①，而是采取渐进双轨制推动制度变革。在继续运用计划手段发展国有经济的同时，允许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成长起来，并逐渐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渐进双轨制可以较好地调和、平衡制度转轨过程中的各方利益，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制度收益。在推动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由农业转向效率更高的二、三产

^① 莱茵模式（Rhineland Capitalism）由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在其 1991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1999 年 10 月出版）一书中提出。莱茵模式主要指以德国、瑞士、挪威、瑞典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代表的欧元区所奉行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强调社会公平和社会市场经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Anglo-Saxon Model）也称为“新美国模式”，“新”是相对罗斯福秩序时代的“曼彻斯特模式”而言。该模式于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里根—撒切尔革命而产生，在布什政府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该模式崇尚自由主义和充分竞争，主张市场自发调节，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减税，缩减公共开支，削减福利，贸易自由化等。

业，从农村进入城镇，资本不断广化和深化，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改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2. 高速增长是制度转轨进程中的阶段性经济追赶现象

将一个经济体某个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放到其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这种阶段性的高速增长并无太多特殊性。从历史连续的视角看，尽管不同经济体在快速增长的起动时机、持续时间和制度环境上存在较大差异，但阶段性高速增长仅是经济体在其长期发展历程的某个阶段所表现出的一种经济追赶现象^①。

近现代以来，受制度、战乱等影响，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慢，经济和收入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49年的人均收入甚至低于1820年的水平（麦迪森，2011）。新中国成立后，制度变化带来农业和工业技术进步，人口数量随收入增长迅速增长，而缓慢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农业规模报酬递减阻碍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至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

改革开放后，制度转轨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大量剩余青壮年劳动力转向效率更高的二、三产业，人口库兹涅茨效应^②得到释放，储蓄率普遍较高，促进资本的不断广化和深化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与发达经济体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使我们能够通过引进模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在适宜制度环境下快速增长，使我们相对发达经济体增长得更快。这种增长潜力被长期压缩后的集中释放，使我国实现了阶段性的经济追赶，并使我

^① 青木昌彦以购买力平价的GNP、人口及其在各产业间的比重等指标，将我国晚清时期、日本幕府时期、韩国朝鲜王朝后期以后的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并比较各个阶段的增长绩效，结论是，不同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存在相当大的共通性，但在发展阶段的起始时间、持续时间、制度形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见青木昌彦（2011）。

^② 历史上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z）发现，农业部门产出和就业比重的长期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效率更高的非农部门的转移，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经济增长，这被称为人口库兹涅茨效应。库兹涅茨效应是后发经济体实现经济追赶的重要条件和动力，部分东亚追赶型经济体农业就业比重的减少被压缩到相对发达经济体短得多的时间内完成，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相较发达经济体要显著得多。据他计算，美国农业就业比重从50%下降到31%，用了40年（1870~1910年），德国从42%下降到29%，用了51年（1882~1933年），法国从52%下降到33%，用了70年时间（1880~1950年）。见青木昌彦（2015）。

国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呈现出明显的有条件趋同特征（罗德里克，2012）。

（二）追赶型高速增长后必然出现增速的明显回落

1. 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使然

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增长减速源于增长要素的变化。首先，追赶型增长过程中库兹涅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下降。过去几十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源源不断地向二、三产业转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快速增长。随着农村劳动人口向城镇转移速度的下降，库兹涅茨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减弱。其次，即使没有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面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持续的技术进步也会增强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偏好。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和回报增加时，父母们会倾向于少生孩子^①。出生率下降导致劳动人口增速下降，2014年开始已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再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收入增长、社保体系健全会倾向于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尽管现阶段储蓄率受收入、社保等因素影响仍然较大，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储蓄率必然呈现缓慢下降的长期趋势。最后，我国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或追赶空间相对于发展初期已明显缩小，技术追赶的成本和难度越来越大。

库兹涅茨效应减弱，劳动、资本增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必然要下一个台阶，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历一段时期的中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最终有可能向全球增速的均值水平回归^②。

2. 追赶型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下台阶是普遍现象

“二战”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

^① 见 Becker、Murphy 和 Tamura (1990)、Galor 和 Weil (1996, 2000)、Lucas (2002)。我国各省从2014年1月开始陆续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按照部分人口专家的预计，2015年出生人口应该有明显增加，但实际统计结果是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4年净减少32万。

^② 普利切特和萨默斯用佩恩表8.0 (Feenstra, Inklaar and Timmer, 2013) 中的数据，计算所有完整数据经济体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结果显示，各国增长率回归均值是一个一致而又稳健的事实，“增长过程具有强烈的回归均值的性质”，国家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不可能永续。见普利切特和萨默斯 (2015)。

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马耳他、阿曼、博茨瓦纳等经济体，在25年或更长时间内保持了年均7%及以上的增长（林重庚等，2011），它们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后，经济增速都出现了明显下滑。如日本经历了1951~1973年23年、韩国1963~1991年29年、新加坡1965~2007年43年、巴西1969~1980年12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均明显下行一个台阶（见表1-1）。

表1-1 部分追赶型经济体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明显下行一个台阶

起止年份	持续时间（年）	年均增速（%）	起止年份	持续时间（年）	年均增速（%）
日本			韩国		
1951~1973	23	9.3	1963~1991	29	9.5
1974~1991	18	3.5	1992~2001	10	6.5
1992~2001	10	1.4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1951~1988	38	8.5	1950~1987	38	9.2
1989~2001	13	3.8	1988~2001	14	4.7
新加坡			巴西		
1965~2007	43	8.4	1969~1980	12	9.1
2008~2014	7	4.8	1981~2001	21	2.1

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韩国、巴西的经济增速为1990年国际元不变价，新加坡为可比价增速的算术平均值。新加坡数据截至2014年，其余经济体数据截至2001年。

资料来源：新加坡数据来自Wind，其余经济体数据根据《世界经济千年史》表C3-b、表C2-b整理。

3. 经济减速的幅度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

如表1-1所示上述经济体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幅度相差很大，如韩国经济增速由9.5%下降到6.5%，下降了3个百分点；巴西由9.1%下降到2.1%，下降了7个百分点；日本则从9.3%下降到3.5%，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一段时期后进一步下降到1.4%，2001年至今处于增长停滞状态。

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减速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经济减速幅度大，巴西甚至直接从高速增长进入低速增长，经济追赶中断。二是仍有经济体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如韩国经济增速下台阶后，

仍有 10 年左右时间保持了年均约 6.5% 的经济增长。如果中高速增长能够持续一段时期，长期的复利效应会使它在追赶发达经济体中占有很大优势。三是经济增速下行幅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密切相关。经济增速下行幅度的巨大差异很难直接从劳动、资本要素上得到充分解释。如果日本经济增速急速大幅下降还可以归结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负增长和储蓄率下降，巴西经济增速下降 7 个百分点（见表 1-1）则无法从劳动、资本的变化上得到充分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要素如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的差异，很可能是导致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幅度差距巨大的重要原因。

二 “十三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在一个幅度较大的区间

（一）主要成果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几近消失和储蓄率大幅下降可能有误

近年来，朱海斌（2014）、张军（2013）、Lee and Hong（2010）、王小鲁等（2009）用经济增长模型法，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中心（2013）、马骏（2010）用 CGE 模型法，兰特等（2015）、林毅夫（2014）、刘世锦等（2010）用国际比较法对我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过预测，青木昌彦（2015、2011）、蔡昉（2014、2012）同时采用经济增长模型法和国际比较法，多次对我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过分析。

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值集中在 5%~7%，悲观的结论是潜在增长率会下降到 4% 以下（兰特等，2015），而乐观的预计是我国未来具备年均 8% 的增长潜力（林毅夫，2013）^①。

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给出的核心理由

^①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承担的宏观院 2011 年重点课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研究》预测 2011~2020 年潜在增长率为 6.9%（照常情景）~7.9%（乐观情景）。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运用卢卡斯增长模型，设定两种状态预测 2008~2020 年经济增速超过 9%。也有一些国内外知名学者就我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发表过观点，但未公开发表定量分析、推理过程，本书未进行归纳。

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净减少，人口红利^①消失；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明显减少，库兹涅茨效应几近消失；三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率和资本形成增速下降；四是国与发达国家的总体技术水平差距所决定的技术追赶空间缩小，追赶难度增大，未来通过技术引进、模仿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

在上述导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四个方面的理由中，我们认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理由一）和追赶差距缩小（理由四）对潜在增长率的不利影响，是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发展进程中两个几乎不可逆转的事实。认可库兹涅茨效应下降（理由二）和储蓄率下降（理由三）的总趋势，但不认可库兹涅茨效应在“十三五”时期接近消失，也不认同储蓄率在“十三五”时期会出现大幅度下降。

（二）未来包括库兹涅茨效应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区间较大

1. 主要成果忽视了库兹涅茨效应在我国地区上的巨大差异

劳动人口由农业向效率更高的二、三产业转移，可以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后发国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追赶的重要手段。1997~2006年、2006~2015年两个十年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下降了7.3个和14.3个百分点，劳动人口从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到2016年，全国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已下降到27.7%，而日本、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时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约为20%（青木昌彦，2015），比照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似乎库兹涅茨效应这一此前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已经消失^②。

^① 人口红利指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一般用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或工作年龄人口增速表示。

^② 国内外有关我国潜在增长率的部分研究，有的直接从库兹涅茨效应出发进行预测，有的以其他定量方法进行预测但以库兹涅茨效应的下降作为定性分析的理由。学界公认度较高的部分研究成果将日本1970年、韩国1990年高速增长结束时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下降到约20%、经济增速下行约3个百分点，作为判断我国未来经济增长轨迹的依据，见青木昌彦（2015, 2011）、蔡昉（2014, 2012）、刘世锦等（2011）。